

醫學倫理思想 在《聖濟經》中的體現

張巧霞

摘要

宋代政治、經濟、科技、哲學、風尚等諸多因素促進了醫藥學的發達與繁榮。《聖濟經》猶如宋代醫藥學百花園中一朵瑰麗的奇葩，為後人從醫理到實踐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聖濟經》（10卷，分42篇，注重理論）同《政和聖濟總錄》（亦稱《聖濟總錄》，醫學百科，200卷，分66門，闡述病因、病理及醫治藥方）都是由宋徽宗趙佶（1082-1135）親自主持編纂的醫學大作。《聖濟經》除了確立儒家的綱常倫理之外，更在本體宇宙論的氣論框架下構建了道家身心平和的基本醫學原理。《聖濟經》所體現的醫學倫理思想，如“陰陽合而夫婦正”、“五行有殊相”、“氣者生之元也”、“子之在母”、“去邪輔正，以平為期”等，突出表現了儒道相容的陰陽觀、五行觀、整體觀和辯證觀，同時展現了宋代獨特的政治生態和文化特徵。

【關鍵字】 《聖濟經》 醫學倫理思想 氣論 陰陽觀 五行觀

張巧霞，河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生，中國保定，郵編：071000。

《中外醫學哲學》XII:1 (2014年)：頁55-66。

© Copyright 2014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宋代朝廷的醫藥政策，科技的高度發達，皇帝的率先垂範，思想家的引領，士人尚醫風氣的共同合力下，促進了宋代醫藥學的發達與繁榮，《聖濟經》在本體宇宙論的氣論框架下構建了身心平和的基本醫學原理，與此同時注入了儒家的倫理思想。《聖濟經》猶如宋代醫藥學百花園中一朵瑰麗的奇葩，為後人從醫理、倫理到醫學實踐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宋徽宗聖濟經》亦稱《聖濟經》乃宋徽宗親自命名的醫藥學代表作，全書分〈體真〉、〈化原〉、〈慈幼〉、〈遠道〉、〈正紀〉、〈食頤〉、〈守機〉、〈衛生〉、〈藥理〉、〈審劑〉，共十篇四十二章。宋徽宗趙佶感於世人不得《內經》之真傳，以“至號醫者流，與謂易卜筮者何異”，故而在“萬機之餘”，通過“務法上古，探天人之曠，原性命之理，明榮衛清濁，究七八之盛衰，辨逆順、鑒盈虛”（趙佶，1978，〈禦制序〉）。全書以闡發《黃帝內經》要義為旨，援引六經，旁及老子之言，論及陰陽五行、運氣、體質、色脈診、藥物、方劑、養生、氣功、孕婦養護、嬰兒養護及各種病證等。《聖濟經》作為中國首部醫學考試命題藍本的醫書，其所闡述之理論對宋代醫學有相當的影響。

《聖濟經》的陰陽觀、五行觀、氣論、整體觀、辨證觀所蘊含的醫學倫理思想甚為突出。

一、陰陽觀

陰陽是中國傳統哲學之基本範疇。“古代醫家把陰陽學說密切地結合到醫學領域中來，把它延伸、演繹為醫學專業的內容”（嚴世芸，2005，7），陰陽學說“貫穿中醫理論體系的各個方面”（楊金長，2005，90）。《黃帝內經》發展了前代陰陽觀，將其運用於醫學，闡明人類生命起源，生理現象。《黃帝內經》言：“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黃帝內經·素問》，1963，31），陰陽是萬事萬物的根本規律，診療疾病必須探求陰陽這一根本。“陰陽者，血氣之男

女也”(《黃帝內經·素問》，1963，42)、“陰者主髒，陽者主腑”(《黃帝內經·素問》，1963，81)，陰陽產生人的生命。

《聖濟經》繼承發展了《黃帝內經》之陰陽觀，認為陰陽“形精相感”產生萬事萬物：“天有精，地有形，形精相感而化生萬物，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天為陽，地為陰，水為陰，火為陽，陰陽者，血氣之男女，水火者，陰陽之證兆。惟水火既濟，氣血變革，然後剛柔有體而質形立焉”(趙佶，1990，55)，天地是萬物的父母，陰陽結合是人類的開始，天地、萬物、人類男女都要遵守至上的倫理原則。“觀其演易說卦，推陰陽之頤。究物性之宜，大或及於牛馬，微或及於果蓏，潛或及於龜蟹，蓋以謂稟氣而生，不離陰陽。惟其不離陰陽，故無一不協於理，而時有可用者矣。”世間萬物，無論大如牛馬，或小如果蓏，潛如龜蟹，都是稟陰陽之氣而生的，都歸於一理。“倫理，不僅與人，而且也與動物有關”(施韋澤，1992，序言)。牛馬懂情，果蓏向陽，龜蟹內斂。其“樂生”的道家倫理思想顯而見之。《聖濟經》對《黃帝內經》陰陽生化萬物需遵循的社會倫理原則加以發揮，說：“天之德，地之氣，陰陽之至和，流薄於一體，因氣而左動則屬陽，陽資之則成男；因氣而右動則屬陰，陰資之則成女”(趙佶，1990，45)，“嬰孺始生有變蒸者，以體具未充，精神未壯，尚資陰陽之氣，水火之濟，甄陶以成”、“故變蒸畢而形氣成就者也，亦猶萬物之生，非陰陽氣蘊熱蒸無以榮變也”(趙佶，1990，56)，動物繁衍後代沒有禁忌和倫理，因此選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人類因有社會倫理原則的約束，就能主動調控陰陽合氣，進而決定人體胚胎發育，甚至決定人的性別。現代醫學也認為，調控飲食、運動、時候等方式有助於胚胎的發育和性別的形成。《聖濟經》還發展了《黃帝內經》陰陽失衡致病的倫理思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不明乎道，未有能己人知疾者。陰陽相照、相蓋、相治……人生其間，由於陰陽……平則為福，有餘則為禍，淫則為疾”(趙佶，1990，1)，“陰不勝陽則脈流薄疾，並乃狂，陽不勝陰，則五臟氣爭，九竅不通”(趙佶，1990，

4) 陰陽平衡是天地萬事萬物的普遍規律，人類更要遵守社會倫理道德準則，不懂得這個道理，就會導致陰陽失衡，產生疾病就不足為奇了。《聖濟經》發展了《黃帝內經》脈學的醫學倫理理念：“陰陽者脈之本，尺寸者脈之部，內外者脈之分……實如是者，持脈之法也。致虛守靜，其神無營，俾事物不得人其舍，乃持脈之道也。近乎法而進乎道，定於己而應於人，則有過之脈可求焉”（趙佶，1990，75）陰陽變化是脈理脈象的根本，要求診脈人摒棄雜念，心空如谷，恪守醫家道德規範的倫理慣則。

二、五行觀

五行是中國傳統哲學之基本概念和範疇，儒道都十分注重五行的內涵與外延。“中醫學在闡釋人與自然的關係、人體自身的整體性和系統性、人體多系統之間的相互聯繫，以及在臨床診斷、治法、用藥、針灸施治時，無不使用五行學說”（楊金長，2005，94）。《黃帝內經》發展了古代五行觀，把其運用到人的生理、病理、藥理等方面。《黃帝內經》認為五行決定人的生命和五臟之氣：“金木水火土也……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臟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黃帝內經·素問》，1963，141），“天有四時五行……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黃帝內經·素問》，1963，34），五行運行，五臟化生五氣，從而人產生喜、怒、悲、憂、恐。

《聖濟經》繼承發展了《黃帝內經》之五行觀。《聖濟經》運用五行觀，進一步說明了五行與五臟的倫理關係：“內合五藏，外幹形體，氣味之禁，皆五行至理”（趙佶，1990，125），人的形體、五臟、五味，都遵守五行各正本位的倫理秩序。“把陰陽五行看作倫理道德的思想基礎”（樂愛國、庾永，2008，68）《聖濟經》說：“五行分五臟”，五行運行，生化胚胎，五臟六腑生成。“五行孕秀，有春夏秋冬異宜者，五形有殊相也”（趙佶，1990，48），人稟受五行的不同，產生不同的四時，生化五種形態各異的器官，春木屬震為足，夏火屬離為目，秋金屬兌為口，冬水屬坎為耳，長夏屬坤為腹，

這正是五行需遵天道倫理的體現。運用五行觀進一步說明了五臟之間的倫理關係，認為：“水木火土金為序者，以其相生有母子之道也。水、火、金、木、土為序者，以其相克有夫婦之義也……命門初具有，有命門然後生心……然後生肺……然後生肝……然後生脾……然後生腎……有腎，則與命門合，而二數備矣”（趙佶，1990，36-39）五行之間“相生”、“相克”，如同母子相及，五行一旦失常，就會母病及子或子病及母。又如夫婦之序，“人之倫類肇自男女夫婦”（戴震，2010，614），“夫婦之義”不僅意味着夫婦倫理的先天產生，同時夫婦倫理還兼備着原始的圓滿的蘊含，故遵守五行天定倫理，才能五行圓潤，身康體健，家興事和。《聖濟經》用五行觀論述人類的生死和疾病治療調養：“蓋五行四時，還相為本……以此視死生，則不過與五氣、五聲、五色之變動。以此為疾病之養，亦不出於五味、五穀、五藥而已。和平之時，順四氣以調神，推五運以明化，相生以相繼，相克以相治，所以致中和。”（趙佶，1990，127）人類的生死只不過是五行順序的變化，人體是小天地，五行應各居其位，木居金位，如鳩佔鵲巢，弟越兄序，違背自然倫理，必遭天殃。治療疾病則不外乎調節五氣、五聲、五色；保養身體亦不外乎調理五味、五穀、五藥，使之相克轉化為相安，相生進而相繼。《聖濟經》將五行化五味引入到日常飲食中：“有為膳夫之職，而以品賞為言者，知飲食不可忽也。欲以不茹葷而為齋戒者，知昏濁之汨性也。有論食不欲雜者，知物雜則或相犯也。有論食欲常淡者，知五味之爽口也”（趙佶，1990，125）。可見，人類的飲食不僅是滿足口腹之欲的個人行為，也是禮治精神的實踐。每一種食物的原料都有陰陽之性，應充分發揮其特性，還須避免食物五行之間相克相撞。比如：春不宜多食酸，夏不宜多食苦，冬不宜多食鹹，秋不宜多食辣。天有五行，人有五臟，食有五味，三者相生相應，飲食理論遵循這個原則，這是飲食倫理化的理論來源。

三、“氣”論

如同陰陽、五行一樣，“氣”論是中國古代哲學最基本的理論，古代醫家“引入古代哲學氣的概念，並結合醫學的內容加以發展，使之成為貫穿整個中醫理論體系的核心範疇”。(楊金長，2005，74)《黃帝內經》繼承和發展了先秦氣一元論學說，幾乎全書都涵蓋“氣”論。《黃帝內經》用“氣”說明生命、生理現象：“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黃帝內經·素問》，1963，159)，天地之氣交感而產生人。這也是“天人合一”的中醫理論基礎。《黃帝內經》闡釋“氣”與五臟的對應關係：“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嗌，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谷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黃帝內經·素問》，1963，45)，“天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生，以養五氣”(《黃帝內經·素問》，1963，67)，“天地之氣”營養五臟之氣，維持人體生理功能。《黃帝內經》認為“氣”與人的情志也密切相關：“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黃帝內經·素問》，1963，361)，“氣”也決定人的情志，五臟生化五氣，從而產生喜、怒、悲、憂、恐五種情志。

《聖濟經》發揮了《黃帝內經》之氣論。《聖濟經》明確闡述了關於“氣”的觀點：“通天地為一氣”(趙佶，1990，88)、“氣者體之充，運轉而不停”(趙佶，1990，132)，宇宙是“氣”組成的，“氣”充於萬物，生生不息，運動不止。《聖濟經》認為“氣”乃構成生命之本：“氣者生之元也……神依氣往，氣納則神存”(趙佶，1990，154)、《聖濟經》以為“氣”與情志相關：“怒則氣悖，故上而不降。喜則氣舒，故緩而不收。悲則心系急，故氣消而不息。恐則精卻，故氣下而不升。思則心有所存，故氣結而不散”(趙佶，1990，134)，“氣”之上下、升降、聚散等運動產生怒、喜、悲、恐、思等情志及其變化，情志倫理更為重要。《聖濟經》用“氣”說明藥理和食物特性：“世之人知藥為真，不知穀畜可以為食治。知性味為本，不知氣臭自有致用之異……觀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蘭草

治脾瘕，鮑魚利腸中，均以氣臭專達”（趙佶，1990，180），世人只知道藥物是治療疾病的真品，不知道五穀畜類等食物也可以食療……只知道以藥性為本，不知道氣臭（xiù）也有用途……用芳草、鮑魚治病，都是憑藉氣臭（xiù）發揮作用。《聖濟經》選用“氣”來養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導引按蹻，所以調其氣也”（趙佶，1990，155），運用“吹”“噓”等呼吸形式，模仿熊鳥動作的引導之術，吐故納新，調“氣”乃是養生倫理的最佳境界。“食氣於母，所以養其形。食味於母，所以養其精。形精資育，氣味為本”（趙佶，1990，44），秉承母親之“氣”以養育其形（身體），秉承母親之“味”來蓄養其“精”，而“氣”是滋養“形”“精”的根本，這是“固本培元”養身倫理的基本原則。“以神為車，以氣為馬，神氣相和，乃可長生”（趙佶，1990，154），“神”猶如車輛，“氣”恰似良馬，車馬合一，才能快意馳騁，人的“神”“氣”和合，才能健康長壽。《聖濟經》主張辯證用“氣”：“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運有大小。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趙佶，1990，85），氣有多少之時，形有盛衰之刻，運有大小之日，“有餘”“不足”循環往復，發展變化，對於有餘的事物或方面應該抑制，對於不足的事物或方面應該扶持，謹守“調氣機”的養生倫理準則。“故春夏溫熱，秋冬涼寒，氣之常也。法四時之氣亦為治……上焉以遠六氣之犯，中焉以察歲運之化，下焉以實南北之宜，合氣之機不可失也”（趙佶，1990，178），春暖夏炎秋爽冬寒是氣之規律，人若遵循四時之氣的變化規律就會平安，這樣，可以遠離六氣的侵犯，清楚一年一度氣運的變化，適應南北不同氣候環境，蘊含了許多寶貴的“樂生”道家倫理智慧。

四、整體觀

天人合一與陰陽、五行、氣論一樣，是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思想。古代醫家“借用發揮了天人合一的哲學觀，以此作為自己的世界觀、方法論和價值觀，來構建中醫理論體系並指導中醫臨床實踐”

(楊金長，2005，132)。《黃帝內經》秉承發展了古代哲學天人合一思想，認為“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黃帝內經·素問》，1963，36)，這樣，《黃帝內經》建構了一個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整體醫學模式。關於人與外部環境的關係，《黃帝內經》認為：“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黃帝內經·素問》，1963，19)，人的陽氣，一日之中均受外界影響。人在日出之時陽氣萌生，中午之時陽氣鼎盛，夕陽西下之時陽氣消弱，陽氣之門關閉。於是，人與外界環境構成一個有機整體。

《聖濟經》承襲發展了《黃帝內經》天人合一思想，形成自己的整體觀。《聖濟經》把母親與胎兒看做一個有機整體，兒胎居於母腹，與母體本屬一脈，經絡相關，氣息相通。母親應主敬存誠，舉止莊重，涵養性天，遵守“天地人”三才之倫理。《聖濟經》還十分重視胎教，曰：“蓋母氣胎育有盛衰虛實，其在子也，固有剛柔勇怯之異”(趙佶，1990，49)，母親懷孕期間胎氣的盛、衰、虛、實，影響胎兒性格特徵，在子女方面表現，或剛強，或嬌柔，或勇敢，或怯懦。又曰：“泥在鈞，金在熔，惟陶冶所成。子之在母，豈無待而然耶？蓋專精孕氣，大鈞賦形，有人之形，不能無人之情。彼其視聽言動，好憎欲惡，雖冥於隱默之中，而美惡特未定也。善母道者，引而發之。若為之訓迪，若為之挑達，彼將因物而遷，因形而革。有不期然而然者，故示以賢人君子，使之知所以好德，示以禮法度數，使之知所以制心。揚之以聲音之和，則若琴瑟鐘鼓者，欲其厭足於耳。作之以剛毅之氣，則若犀象軍旅者，欲其感動於目。觀圭璧珠玉則取。夫陰陽之至精，誦詩書箴誡則取。夫言語之至正，以至調心神，和情性，戒喜怒，節嗜欲，是皆因物隨感，有益於得者也。若乃人有殘廢，物有醜惡，鳥獸之有毒怪者，則欲其勿見。若形有不全，割有不正，味有異常者，則欲其勿食”(趙佶，1990，41)如同泥必須在製陶器的轉輪(鈞)上製作，金屬必須在熔爐裏冶煉，才能製成完美的陶器，煉成化為繞指柔的鋼鐵一樣，胎兒在母

體內也必須受到陶冶教化。胎兒在母體內形成之時美醜善惡尚未確定，善於做母親的必須以君子之德、賢人之道以及禮法準則來修養其心，遵守“克己復禮”的儒家倫理思想；用琴瑟鐘鼓陶冶其耳，遵守“兼相愛”的墨家倫理思想；用軍旅剛毅培養其觀察力，遵守“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兵家倫理思想；用詩書啟發誘導，遵守“形神兼養”的道家倫理思想；母親語言優美，性情溫和，心態平和，不過喜，不惱怒，節欲，節嗜，戒貪，對胎兒的發育大有裨益；形狀殘缺醜陋的事物不看，外形不全、分割不正、味道異常的食物不吃。《聖濟經》治病原則體現了整體觀，“流變在乎病，主治在乎物，制用在乎人”，病證、藥物、醫者、病人形成一體，密切配合，才能治病救人，醫患應互尊的倫理原則。《聖濟經》的用藥方法也體現了整體觀的內外兼備的倫理要求，“治內者，自內以達外，酒醴丸散丹之類，見於服飲者是也。治外者，由外以通內，膏熨蒸浴粉之類，藉於氣達者是也”（趙佶，1990，182），藥物內服效力能夠達到體外，藥物外用效力能夠達到體內，以內延外，以外逐內，是用藥倫理的最佳境界之一。

五、辯證觀

辯證觀亦是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理論。《黃帝內經》秉承發展了古代哲學的辯證觀，在研究人體生理、病理和疾病診治過程中，體現運用了變易思維。《黃帝內經》認為氣是運動變化的：“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黃帝內經·素問》，1963，31-32），氣上下運動，可以轉化為雨、轉化為雲，這是講氣的運動；又說：“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黃帝內經·素問》，1963，399-400）氣的出入停止則生命消失，氣升降停息則生命危急；沒有氣

的出入，沒有氣的升降，就沒有生命體的生長、壯大、衰老、消亡。因此，《黃帝內經》認為升降出入是萬物存在的條件。

《聖濟經》承襲發展了《黃帝內經》辯證觀的因人因地因時的三因制宜倫理觀，對具體病症進行具體分析，因症施治，形成自己的辯證思想。《聖濟經》根據病證具體情況決定治療方法，“古今異習，情有醇薄；寬色異見，氣有淺深；經絡之別，侯有表裡；府藏異同，形有內外。蕩滌浸漬，先後之序也。發散收散，陰陽之辨也。清濁高下，緩急之宜也。多寡輕重，久新之正也。要在去邪輔正，以平為期”（趙佶，1990，181），古今習性不一，情有厚有薄；病體膚色各異，氣在體內部位，深淺有別；經絡有別，表現不一；臟腑不同，體內體外有異。要明辨病證，抓住關鍵，扶正祛邪，充分體現了醫學的“貴人”倫理觀。《聖濟經》根據病證決定用藥劑型。說：“湯液主治，本乎腠理，凡滌除邪氣者，用湯為宜，傷寒之治，多先用湯者以此散者，取其漸漬而散解”（趙佶，1990，182），邪氣入侵腠理之病用湯藥，腸胃之病、體表之病用散劑。“凡導引痹郁者於酒為宜，膏取其膏潤以祛邪毒，凡皮膚蘊蓄之氣，膏能消之，又能摩之也”治療痹症用藥酒為宜，治療皮膚病以膏類藥物為宜，這是根據病症辯證用藥，不但符合對症用藥倫理，而且還有藥半功倍的效果。“津液散為枯，五臟痿弱，營衛涸流，濕劑所以潤之，麻仁、麥冬、阿膠、地黃之甘，潤經益血，復脈通心也”（趙佶，1990，182），津液缺乏，五臟機能弱化，營衛之氣衰竭，則用滋陰藥物，用麻仁、麥冬、阿膠、地黃滋潤經絡臟腑，增強氣血津液，疏通經脈和心。用藥治療病症的同時，配合飲食治療，既符合用藥倫理治療原則，又能達到使用同一藥物，對不同部位病證產生不同的治療效果。“凡橘皮入和中理胃藥則留白，入下氣消痰藥則去白”（趙佶，1990，172），橘皮和中理胃健脾宜用白瓢，理氣清痰止咳宜用橘紅。用藥宜分主輔，主輔結合，恪守用藥倫理原則。如是的辯證觀在中國非常普遍，其背後是與“氣”和陰陽相關的整體觀和變化觀。

六、總論

《聖濟經》表現了陰陽觀中陰陽生化萬物需遵循的天地自然倫理原則、五行觀中五臟之間的“相克”、“相生”的夫婦長幼的儒家倫理秩序、“氣”論中“固本培元”的道家“樂生”倫理智慧；其辯證觀中的因人因地因時的三因制宜觀恪守了內外兼備的治療用藥倫理原則；整體觀中的“子之在母”更是遵從了“克己復禮”的儒家倫理思想、“兼相愛”的墨家倫理思想、“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兵家倫理思想、“形神兼養”的道家倫理思想。《聖濟經》集中體現了宋代醫學的發展和醫學教育的成熟，也反映了疾病診斷水準的提高以及臨床各科的進步。

參考文獻

- [德] 施韋澤撰，貝爾編，陳澤環譯：《敬畏生命：五十年來的基本論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Schweitzer, Albert. *Reverence for Life [Die Ehrfurcht vor dem Leben]: An Observation for the Past Fifty Years*, edited by Hans Walter Bähr; translated by CHEN Zehuan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2).
- 楊金長：《中醫哲學概論》，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5。YANG Jinchang. *Introductory Philosoph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China P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5).
- 趙 佶：〈禦制序〉，《聖濟總錄》，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ZHAO Ji. “Preface of Emperor,” *The Complete Record of Holy Benevolence* (Taipei: XinWenfeng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 趙 佶撰，吳 昶注：〈形氣變成章〉，《聖濟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ZHAO Ji.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Xing’ and ‘Qi’*,” *Canon of Sagely Benefaction*, annotated by WU Ti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er, 1990).
- 樂愛國、庾 永：〈道教對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發展的作用〉，《倫理學研究》，2009年，第2期，頁67-74。LE Aiguo and TUO Yong. “Effect of Taoism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 *Studies in Ethics*, 2 (2009), pp. 67-74.
- 戴 震撰，楊應芹、諸偉奇譯，《戴震全書》（第六冊），安徽：黃山書社，2010。DAI Zhen. *The Complete Works of Dai Zhen*, Vol. 6, translated by YANG Yingqin and ZHU Weiqi (Anhui: Huangshan Book House, 2010).
- 嚴世芸：《中醫醫家學說及學術思想史》，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5。YAN Shiyun, *Theorie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China P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5).

《黃帝內經·素問》·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 *The Inner Classic according to the Yellow Emperor: "Basic Questions"*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Company, 1963).